

毛泽东如何克制美军的技术优势

□ 谢 峰 李 明



客观分析美军的长处与短处

毛泽东认为，战争是力量的较量，但敌我双方力量的强弱对比，往往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可以通过正确的主观指导而加以转化的。因此，在面对具有技术优势的美军时，需要冷静客观地分析我军与美军的具体优劣对比，在看到敌人的长处时，也要看到自己的长处，看到自己的短处时，也不能忘记敌人的短处，综合分析敌我优劣，才能真正找出克制美军技术优势的办法。

毛泽东指出美国“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抗美援朝战争决策出兵时，他列举了双方军级部队的火炮对比情况，美国一个军共有各类大中口径火炮 1500 门，而我们一个军才只有 36 门，差距极为悬殊。因此毛泽东说：美军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如果在武器上比较，我们是比不过他们的”。毛泽东还认识到美国具有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是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强的一个，因此美军的物质保障也比较好，打仗时能喝上牛奶、吃到饼干，而我军一天能吃上两三顿饭就吃不起了，难以和他们相比。但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了美军的重大弱点，包括在世界各地都驻军，战线长、运输路线远、力量高度分散，“是十个手指按住了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怕死、士兵“不喜欢打仗”“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等等，整体战斗力并不强，只要指挥得当，完全可以打败他。这就为增强信心、战胜美军的技术优势提供了科学依据，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实践也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正确地分析敌我双方的长短优劣，离不开精心组织的战场调研，这一点毛泽东极为重视。抗美援朝战争出兵时，由于我军此前还从未与美军进行过较大规模的作战，对其虚实了解得不深，因此毛泽东指示向正在与美军交手朝鲜人民军、向此前曾与美军有过合作经历的原国民党军将领咨询美军情况，还多次派遣干部赴朝鲜战场

实地了解，对摸清美军底细、有针对性地制定作战方针起到了重要作用。

充分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

毛泽东认为，面对美军的技术优势，我军囿于综合国力等方面的差距，难以仅从技术层面去与之抗衡，“乞丐与龙王比宝”是不行的。他立足于人民史观和战争“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的重要判断，提出了充分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来克制美军技术优势的制胜路径。

毛泽东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任何先进武器都不能包打天下，“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他曾以抗美援朝战争中汽车的损失为例说，在战争初期，由于美军武器装备占有优势，交通都被破坏了，汽车损失很大。后来发动群众想办法，采取在道路两旁站岗预警、把道路加宽、在水下架桥等许多办法，汽车的损失就由最初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儿。因此，毛泽东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时指出：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毛泽东认为，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而要发动广大人民和官兵一道想办法克制美军技术优势，军队就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对内对外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处理好军政军民关系，发扬军队内部民主，调动大家积极性。毛泽东认为军队内部民主体现了我军的根本性质，是我军的巨大政治优势，强调虽然实行了一些正规化制度，但“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还是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不要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之间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毛

泽东打破美军技术优势基本的战争指导思想，他强调一切从敌我双方的具体实际出发，充分发扬自身优势、减灭敌军优势，完全机动灵活、独立自主地指导战争，夺取并牢牢掌控战争主动权，最终取得战争胜利。

毛泽东多次指出，虽然美军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先进，但是我们并不害怕它，你有你的优势，我也有我的长处，真要打起来，我们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也能扬长避短、以弱胜强。他说：“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我军装备比较简单，重武器很少，一方面造成了火力薄弱的缺点，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轻便灵活的优点。根据此种情况，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指导我军在战役中远距离迂回敌军后方作战，充分发扬了我军轻装灵便的优势，放大了美军重装备部队严重依赖交通线、在朝鲜山区地形上机动不便的缺点；在战斗中我军坚守坑道、打近战夜战，有效弥补了我军装备差、火力弱的缺陷，美军虽有强大立体火力优势却无所用之，反而凸显了部队战斗意志薄弱的弱点。

在实践中运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关键在于结合双方实际找到发扬自身优势、减灭美军优势的具体方法。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集中集体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高度针对性实效性的举措办法：在战略指导上，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和人民战争思想，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充分准备，一手抓尖端、一手抓民兵构建强大战略威慑能力等；在战役指挥上，在敌人大规模入侵我国时要顶放结合，适当的地方和时机顶一下，以“诱敌深入”放进来打为主，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在战术方法上，采取“零敲牛皮糖”、挖坑道、打近战夜战等。这些都成为指导我军扬长避短有效化解美军技术优势的重要原则和策略。

1934年1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简称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下，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在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历时 10 个月，转战近万里，于 1935 年 9 月 15 日到达陕北地区与陕北红军会师，完成长征。红二十五军是唯一发展壮大的长征队伍，是长征途中唯一创建了根据地的队伍，也是最先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西北地区红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红二十五军长征艰苦卓绝、迭挫强敌，不仅是红军将士英勇的奋斗史诗，更是对党忠诚的光辉典范。

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北上抗日

1934 年 8 月，程子华受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遣到达鄂东北地区，传达中央的指示：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举行常委会议，一致同意中央关于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指示，坚决执行北上抗日的命令要求。

1934 年 11 月 16 日，红二十五军出发长征。行军途中，红二十五军通过张贴告示、书写标语、散发传单等方式，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开展政治攻势。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秘书长郑位三，在部队经过沿途，每遇围寨，都事先给寨主头目写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1934 年 11 月 30 日，在进入伏牛山区后，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出布告，明确宣布调动队伍北上，就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红二十五军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方针，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长征途中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根据花山寨会议精神，红二十五军将在桐柏山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到达这里后，发现桐柏山区距离平汉铁路太近，又面临汉水，战略回旋余地不大，难以立足发展。此时国民党军前堵后追，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桐柏山区。中共鄂豫皖省委认真分析形势，果断决定率领部队向伏牛山挺进，相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到达伏牛山区后，经过多方调查情况，了解到这里地域狭窄，人口稀少，粮食和物资都很缺乏；同时，豫西“内乡王”别廷芳在这里统治严密，盗匪出没无常，地主围寨很多，发动群众、开展工作艰难，也不是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理想地方。因此中共鄂豫皖省委再次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进军方向，决定继续西进。

1934 年 12 月上旬，红二十五军进至陕西洛南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会议，认为豫陕边界地区敌人统治比较薄弱，人民生活贫困，阶级矛盾尖锐，加上这里山大沟深、丛林茂密，回旋余地较大，便于活动，符合中央关于创建新根据地的原则，于是作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决策。会后，红二十五军全力开展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到 1935 年 5 月初，红二十五军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人口近 50 万，耕地面积 90 多万亩。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央关于创建新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同时结合客观实际情况，先后数次调整进军方向，从而使队伍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积极策应党中央与中央红军顺利北上

长征途中，部队没有电台，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他们千方百计寻求党中央的信息，力图策应中央和主力红军的长征。政委吴焕先多次说：“消灭敌人一个团，都不如缴获一部电台，有了电台就可以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1935 年 7 月，红二十五军从缴获的报纸上和交通员带来的信息中获悉，党中央、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边地区集结，企图围歼主力红军。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连夜在长安沔峪口召开紧急会议，毅然决定红二十五军主力撤离已经营半年之久、相对稳固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立即向甘肃方向挺进，牵制敌人，策应党中央与主力红军北上，提出“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的口号。副军长徐海东满怀

红二十五军：万里长征赤胆忠心

□ 王东伟

激情地说：“我们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这对中国革命有重大意义。在此行动中我们要不惜最大的牺牲，迎接中央北上。”在继续北上的途中，红二十五军积极活动于隆德、平凉、泾川等地区，切断西兰公路 18 天，迫使敌人一再抽调原用于堵截中央红军的兵力来对付红二十五军，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对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起了战略性配合作用。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入冬后，中央红军物资补给面临极大困难，毛泽东准备向徐海东借 2500 元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立即从部队仅剩的 7000 元中拿出 5000 元送给中央红军，并命令部队节衣缩食，从人员、物资上全面支援中央红军。徐海东说：“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啊！”对此，毛泽东称赞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这不仅是对徐海东，更是对红二十五军历史功绩的高度评价。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也付出了巨大牺牲。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牺牲营级以上干部达 50 余名，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先后牺牲，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都曾身负重伤。

严格执行群众纪律

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严格执行党的群众纪律，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红二十五军每到一地，不仅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而且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帮助穷人免除一切捐税。红军攻克洛南县后，对正当经商的几十家中小店铺，都按政策加以保护。有的店主在红军攻城时逃走了，红军还派战士对其店铺妥善看管。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时，根据广大群众反抗捐税的迫切要求，提出了“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的“五抗”口号，在攻克镇安县城后，发布告群众书，号召立刻组织穷人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员会。西征北上的过程中，红军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全体指战员自己打草鞋、缝军装、背粮食、挖野菜、搭茅棚，甚至忍饥作战，赤脚行军，但始终恪守生活纪律，不动群众一针一线。在宁夏单家集、兴隆镇等回民聚居区，吴焕先提出“要争取革命成功，必须团结和发动各族人民”，专门制定“三大禁令、四项注意”。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积极进行助民劳动，街头巷尾，到处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军医院的医护人员热情为群众治病。红二十五军这些举动，使回族人民深受感动，也激发了回民和其他各族群众拥护红军、参加红军、抗日救国的积极性，极大地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毛泽东在中央红军与红二十五军会师时盛赞：“红二十五军民族政策水平很高，执行得很好。”

（作者系河南省信阳市委书记、大别山干部学院党委书记）

邹衍：忠诚的“大警卫员”

□ 张 元

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是新中国第一支人民公安武装，是为适应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保卫首都需要而组建的，后来整编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该纵队建制时间虽然不长，却在警卫史上留下了光辉一笔，毛泽东称“有了你们，我们就放心了”。邹衍是纵队的第一任政治委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尽心竭力，忠诚担当，做到了对党和人民绝对负责，可以说是党中央忠诚的“大警卫员”。

解决“思想转弯”问题

1949 年 8 月 31 日，中央军委命令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辖第 1 师、第 2 师）。邹衍被任命为纵队政治委员兼第 1 师政治委员。作为政委，他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由此催生部队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工作热情自然就带动起来。

部队刚调整转隶时，许多指战员因为不能参加南下作战而感到遗憾，有的认为警卫工作相比作战任务“低人一等”。还有的在执勤一段时间后，产生了居功自傲、和平松懈的思想，以“走过京，闯过卫，天安门前摆过队”自居，甚至与地方比待遇，想解甲归田等。邹衍始终关注部队人员的思想状况，认为部队中产生这些问题对完成任务是十分不利的，对于一支担负保卫党中央重任的警卫部队来说有些问题更是严重的。针对这种情况，邹衍等领导在师党委会上提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的口号，并立即布置部队进行广泛教育。他和纵队领导指示部队反复学习党的城市工作政策，正确看待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深

入学习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树立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战斗队的思想；请朱德总司令亲临检阅纵队作指示鼓士气。通过一系列教育，广大指战员实现了思想上大转弯，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警惕性投入警卫工作。

中央纵队成立后还受领了一项特殊任务，就是疏浚中南海。在此之前，中南海已有上百年没有进行清淤疏浚了，并且缺少现代化的大型设备，要求纵队 50 天内完成污水排净和十几万立方污泥清运，任务非常繁重。由作战到警卫，由警卫到施工，又一次面临思想转弯的问题。邹衍作为中南海清淤工程指挥部总指挥，要求清淤工作作为改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生活环境、提升首都环境质量的重要任务去动员部署，提高官兵的思想认识。开工之前，他要求师团两级分别召开动员大会，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教育。工程期间，他想方设法激发官兵的革命斗志和热情。为此，出版了《疏海快报》，各连队创办黑板报，工地广播站随时宣传上级指示，纵队政治部组织师文艺队到工地演出，各单位还适时开展劳动竞赛和争当突击手活动，仅用 20 天时间就提前完成任务，得到上级工程指挥部门的充分赞扬。

“忠心耿耿，其笨如牛”

公安部长罗瑞卿后来评价警卫工作“忠心耿耿，其笨如牛”。“忠心耿耿”是中央纵队的灵魂，忠实可靠是对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其笨如牛”表达了做警卫工作的严谨细致，不折不扣。邹衍作为纵队政委，率先垂范，带领纵队圆满完成上级赋

予的任务。

接护党中央、毛泽东进驻北平中，邹衍研究部署警卫方案，细致检查警卫工作甚至每一个细节。中央警备团入城的头 3 个月中，大多数分队干部、战士不曾脱衣睡觉。有的警卫目标，一个人一夜要站两三次岗，有的甚至彻夜站岗，有的吃饭都换不下岗来。护卫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专列中，邹衍要求想尽一切办法调查了解铁路情况，沿着路基一米一米地搜查爆炸物，亲自乘压道车沿途检查。有些战士对桥梁检查一遍不放心，不畏寒冷，一次一次地下水里反复进行检查。有的战士连续执勤 12 小时，不松懈不叫苦不抱怨。警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时，邹衍等纵队领导始终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第一时间召开纵队党委扩大会进行部署，命令全纵队立即进入一级戒备，干部不离岗战士不离枪，防止暗藏敌人乘机破坏。仅在西郊即协同公安机关查获逮捕反革命分子 7 名，发现嫌疑分子 36 名，搜缴隐匿枪支 23 支、手榴弹 10 枚。

警卫开国大典中，邹衍与纵队领导亲自勘察地形选定制高点，布置警卫哨，对每个值勤点逐一认真检查，反复叮嘱指战员要提高警惕，恪尽职守，绝不允许出现任何纰漏和闪失。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市区、郊区上千个哨位上，警卫战士们高度警惕，连续奋战十几个小时，胜利完成开国大典的保卫工作。此外，纵队还圆满完成保卫香山、警卫国共和谈代表团、保卫第一个国庆节等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毛泽东、朱德还分别为 2 师的士兵报、1 师的战士报题写了报头。

